

中国外交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 动因与态势

江瑞平

摘要: 对日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关系持续回暖、经济关系出现波动、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关键阶段、全球经济风险趋于恶化、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新局面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步入了全新阶段。当前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呈现出多层面的新态势, 动力更加强劲, 目标更加明确, 层次更加清晰, 机制更加完善, 领域空前拓宽。

关键词: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外交协调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强化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 经济外交在中国全球战略和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日趋凸显。日本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又是中国周边近邻, 在中国“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战略布局、尤其是经济外交布局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以民间为主体的经济外交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国对日外交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和中日经济关系在波动中不断发展, 近期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之所以能够进入目前的全新阶段, 是如下几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 政治关系持续回暖, 为新阶段中国对日经济外交营造了良好环境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日趋强烈, 经济关系发展越来越受到政治关系的广泛、深刻影响。由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特殊因素的影响, 中日政治关系与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值得关注。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恢复邦交正

常化之前, 政治关系的断绝曾严重影响了对日经济外交的开展, 只能依赖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外交来发展规模狭小的双边经贸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 为对日经济外交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但到70年代末以前, 由于中国尚未改革开放, 因而还不具备全面开展对日经济外交的国内条件。政治关系发展与经济外交开展形成良性互动的最好时期, 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此间双方在经济层面的外交协调不断扩展和深化, 无论是民间经贸往来还是官方经济外交都获得了全面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 由于时任日本首相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于僵冷状态, 严重影响了对日经济外交的发展。其主要表现至少包括: 在双方都在积极推进双边自贸区建设的同时, 唯独在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中日之间, 却未能就组建自贸区进行外交协调; 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方面中日外交协调不够, 以致日本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提出构建东亚货币基金的设想, 未能得到中方的支持, 在推出东亚货币单位或东亚货币指数方面, 中日双方也存有明显分歧, 等等。

好在2006年10月安倍首相上台不久即成功

* 江瑞平,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037)。

实现访华,中日双方在北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提出要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简称“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在东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进一步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和内涵达成共识,并明确提出了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合作举措。从安倍首相“破冰”到温家宝总理“融冰”,僵冷数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开始回暖,为扩展和深化对日经济外交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在东京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明确界定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内涵,即“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中日还就强化双方经济合作达成多项共识,提出多项切实的经济合作举措,主要包括:(1)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2)加强能源环保、农业、知识产权、中小企业、信息通信技术、金融等经济层面的互利合作;(3)加强在地区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事务层面的合作。¹

福田首相继任后,更为开始转暖的中日政治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其一贯奉行的重视东亚外交的理念,为目前的中日政治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2007年底他在中国的“迎春之旅”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2008年5月6日—10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国家首脑访日时隔10年之后再度成功访日,对巩固中日政治关系的回暖态势、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舆论将其称为“暖春之旅”。5月7日,胡主席与福田首相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被视为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签署的第四份政治文件。声明从双边、区域和全球三大层次,界定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地位、战略意义和崇高目标,并决定在五大领域开展全面合作:(1)增进政治互信;(2)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3)加强经贸、能源和环

保等领域的互利合作;(4)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5)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

主要因为国内政治、经济、民意等问题的严重困扰,福田已于9月1日正式辞职,新任首相麻生太郎可能会对日本的对华外交进行一定调整,从而对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产生一定影响。调整的方向如何、力度怎样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破冰”、“融冰”到“迎春”、“暖春”,中日两国领导人近两年营造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势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从而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发展对日经济外交的政治环境。

(二) 经济关系出现波动,为新阶段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提出了迫切要求

前些年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僵冷,已经给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多层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出现严重波动。其主要表现:一是中日双边贸易增速相对减缓,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比重显著下降。2004、2005、2006年和2007年,中国对日贸易分别比中国外贸总体增速低10%、13.3%、11.3%和9.6%,结果导致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2003年的15.7%下降到2007年的10.9%,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曾一度高达1/4上下,1985年达到27.2%。²二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2006年和2007年在华日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减少29.38%和24.59%,其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0.8%下降到2007年的4.8%,整整下降了6个百分点,2008年1—2月更下降至4.2%。³此外,在中日经贸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值得关注、甚至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如最近发生的“饺子中毒”事件。

中日双方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济关系出现如此严重的波动,势必会对两国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乃至整体双边关系造成巨大影

¹ 参见江瑞平:《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涵义》,《日本学刊》2007年第4期。

² 《进出口统计》商务部官方网站,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iti>

³ 《外商投资统计》中国投资指南网站,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default.htm>。

响。减缓和避免双边经贸关系的剧烈波动,是两国经济和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也对对日经济外交提出了迫切要求。

(三) 东亚经济合作进入关键阶段,需要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协调共同推进

1997—199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的东亚经济合作已走过了整整10个年头,目前已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应该说,以往东亚经济合作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金融合作方面。如清迈机制下的货币互换规模已达830亿美元,与日本方面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初提出的东亚货币基金的规模1000亿美元已相差无几,尤其是规模达800亿美元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跨入更高阶段。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也是东亚金融合作取得进展的重要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与欧洲和北美两大世界经济区相比,东亚经济合作还明显滞后,尤其是在自贸区建设方面,“10+3”框架下的统一的自贸区谈判迄今仍未能启动,尽管“10+3”的区内贸易比率已高达53%。即便是进展最快的金融合作,在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汇率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仍十分落后,很难满足内外金融经济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日趋扩散和深化导致全球金融振荡的背景下,更给强化东亚金融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

中日是东亚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地位举足轻重。目前中日两国合在一起,要占到东亚(“10+3”)经济总量的80%和贸易总量的60%,截至2008年6月底,两国外汇储备高达28103.75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40%和东亚外汇储备总量的70%。¹必须承认,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中日相互之间的外交协调不够,是迄今东亚经济合作难以有效推进的主要障碍。在金融合作层面,如上所述,早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日本方面就提出了构建东亚货币基金的设想,之所以未能实施,除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反对外,未能得到中方的支持和配合也是主要原

因。在贸易合作方面,东盟内部及其与中日韩分别达成的组建自贸区的协议正在全面推进,日韩也已启动了自贸区谈判,唯独在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中日两国之间却未能启动自贸区谈判,中日在组建自贸区方面的外交协调不够,目前已成为组建统一的东亚自贸区的最大障碍。

如上所述,在中日正在努力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中,已将加强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的协调列为重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举措。衷心希望中日双方能够通过积极的外交协调,消除所谓“争夺主导权”的疑虑,寻求更多的区域共同利益,真正承担起作为区域大国在推进区域合作方面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四) 全球经济风险逐渐趋于恶化,需要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协调共同应对

全球经济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周期性增长,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和问题。其中最应关注的,一是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空前增大,三是国际油价急剧攀升。这些风险都对中日两国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了巨大冲击,而靠各自的力量单独应对又很难奏效,只有通过两国的外交协调和合作才有望共渡难关。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全球经常收支失衡,全球经常收支逆差加顺差总额在2001年仅为6417亿美元,2006年已增至20421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2.18倍。而全球经常收支失衡又主要集中于美国,2006年美国一国占到全球逆差总额的80.3%。²而美国对外收支失衡加剧,再加上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美元实效汇率从2001年已累计贬值37%,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之势进一步加剧,对16种主要货币全线下挫。”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对中日两国经济运行和对外经贸关系均造成了巨大冲击。如上所述,中日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美元又在两国外汇储备中占据很大比重,美元持续贬值均给两国

¹ [日]财务省官方网站, <http://www.mof.go.jp/1c006.htm>。

² 同上。

³ 何帆等:《2008美元汇率走势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FCIE,2008-02-19。

造成巨额资产损失,若接近一年美元对欧元贬值16%、美元占中日外汇储备70%计算,近一年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已达3000多亿美元。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也对人民币和日元造成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累计已对美元升值10%以上,目前已经冲破1美元兑7人民币元大关。从2007年夏到2008春,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近25%。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已成为目前影响日本外贸增长从而实现经济稳定的严重问题,2008年1月,日本对外贸易出现了897.89亿日元的逆差,4—6月日本出口仅增长1.8%,6月甚至出现了1.8%的负增长。¹如何避免和缓解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对经济运行和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恶劣影响,应该成为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重要议题。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要想有效化解本币升值压力,保证经济稳定和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离开对方在金融、货币和宏观经济层面的协调与合作极难奏效。如果双方外交协调不够,甚至单方面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只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从而严重损害两国对外贸易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第二次中日财长对话会议上,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日本财务大臣呼吁日本与中国迅速建立一个信息交换机制,以便采取协调的步骤,来共同应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维护两国和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两国财长还就人民币升值和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协商。这应该是中日通过外交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的良好开端。

(五) 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新局面,需要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协调相互支持

中日两国经济都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对外经贸关系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在第一篇“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中明确规定: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此,还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作为“十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节能减排问题,环境和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大课题。为完成节能减排的既定目标,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而日本的节能环保技术绝对位居世界领先水平,也拥有节能环保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同时,日本也希望在节能环保、减排、防止气候变暖等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合作。但要真正在节能环保方面实现有效合作,共同启动一些大型的节能环保项目,还必须实现有效的外交协调和相互支持。

目前日本经济运行与对外经贸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颇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度提高,而在美国经济面临减速的背景下,“中国特需”越来越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因为伴随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提升,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05年和2006年,净出口对日本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8%和33.3%,而2007年已提升至52.4%,2008年第一季度更提升至57.1%。²2000年,对华和对美贸易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的9.9%和25.0%,对美贸易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对华贸易,而到2007年,对美贸易所占比重已下降至16.1%,而对华贸易所占比重已升至17.7%,比对美贸易高出1.6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对华贸易增长对日本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1.98%,其中对华出口对日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33.88%。2008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增长速度比

¹ [日]财务省官方网站,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gaiyo200825e.pdf>

² [日]内阁府:《季度别GDP速报》2008年9月12日。

对美贸易高出 10.8 个百分点, 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也高出 2.5 个百分点。¹ 由此可见, 通过外交协调稳定对华贸易, 越来越成为日本经济稳定运行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重要条件。

二

由上述因素共同决定,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呈现多层面的新态势, 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 动力更加强劲

上述与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环境的全面、深刻变化, 为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正是在这些动力的强力推动下, 才使中国对日经济外交能够克服来自不同方面的阻碍和干扰, 在波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也正是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规范、体制和政策, 才使中日经贸关系虽然出现了上述波动, 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持续发展, 不断推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在有些曾经出现转冷迹象的经贸领域, 目前又开始显现回暖的势头。如中国对日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5 年曾跌至最低点 9.9%, 2006 年已回升至 12.5%, 2007 年 13.9%, 2008 上半年更提升至 17.7%。贸易规模亦连创新高, 2005、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达到 1844.4 亿美元、2073.6 亿美元和 2360.2 亿美元, 2008 上半年已达 1296.1 亿美元。²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也在 2006 年减少 29.58%, 2007 年减少 24.59% 之后, 2008 年 1—8 月增长了 6.61%。³

(二) 目标更加明确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目标, 首先可以从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布局来界定。如前所述, “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两大层面, 而日本既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又是中国周边

近邻, 因而在规划和落实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目标方面,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⁴ 为中国战略机遇期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 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为中国外交总体战略设定的基本目标,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必须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服务。其次也可以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布局来界定。十七大报告也界定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 即“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⁵ 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 没有稳定的中日关系, 就没有稳定的周边地区环境。再次还可以从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来界定。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已成为中国对日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2007 年 4 月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明确指出: “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 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 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基于这一认识, 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 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 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 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 “深化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 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⁶ 显而易见, 扩展和深化对日经济外交, 是推进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途径。最后还可以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界定。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明确指出: 要“增强发展协调性,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加强

¹ [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07年的日中贸易》、《2008上半期的日中贸易》。

² 《进出口统计》商务部官方网站, <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iti>

³ 《外商投资统计》。

⁴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l>

⁵ 同上。

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而通过推进对日经济外交, 加强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中日合作, 显然有利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有效实施。

(三) 层次更加清晰

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主要从三大层次同步展开, 协调推进: (1) 在双边层面, 主要是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下, 通过对日经济外交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扩展和深化提供有利的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为此, 应积极推进启动中日自贸区谈判, 建立有效的双边投资规范机制, 加强在节能环保、农业、知识产权、中小企业、信息通信技术和金融领域的协调合作。(2) 在区域层面, 主要是积极承担起作为区域大国在推进区域合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对日经济外交协调双方在东亚贸易、金融、投资等合作领域的立场, 消除所谓“主导权之争”的疑虑, 加速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目前最需协调的领域主要包括: 如何进一步推进清迈机制的多边化, 探讨推出亚洲货币单位或亚洲货币指数的可行性, 尽快启动统一的东亚自贸区谈判, 加强以东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为中心的投资合作等。(3) 在全球层面, 主要是在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次贷危机扩展、美元持续贬值、国际油价攀升等经济金融风险空前增大的背景下, 通过对日经济外交协调来共同应对。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上述三个层次不是彼此割裂的, 而是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双边和区域层次, 中日之间的许多双边经济外交协调都是在区域场合展开的, 而区域合作的有关重大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中日双边经济外交的重大课题。

(四) 机制更加完善

以往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存在的问题之一, 是各对日经济外交相关部门, 如外交部、商务部、发

改委、财政部等, 在一些对日经济外交重大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各自为政现象, 缺乏足够的协调配合、统一行动。在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中, 尤其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正式启动, 这一局面正在明显改善。温家宝总理在该机制的启动仪式上明确指出: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的启动, 标志着中日经济合作将被提高到更高水平。对话机制的主要任务一是交流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 加深相互了解; 二是协调跨部门经济合作事宜, 探讨合作中相互关切的重大问题; 三是加强在重大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政策沟通, 促进两国更广领域的合作。”¹ 从温总理对这一机制的功能定位来看, 这一机制具有宏观性、高层次、跨部门三大特点, 不仅要就中日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协调, 而且要就各自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对话; 不仅要在双边经贸关系和两国国内经济战略、政策层面上坦诚对话, 而且要在地区和国际经济事务层面上协调立场; 不仅要使参与中日经贸合作的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到位, 而且要在更高层面上对有关参与部门统筹布局、协调配合。2007年12月1日, 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中方有一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出席, 日方有六位内阁大臣出席。从双方发表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新闻公报》来看, 对话已经取得了多方面成果, 并表示“应继续发挥该机制的作用, 一致同意于2008年底在东京举行第二次对话”。²

(五) 领域空前拓宽

中日经济关系在很长时期主要集中在双边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三大方面,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也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展开。步入目前的新阶段之后, 在这三大领域, 中国对日经济外交还依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尤其是要妥善处理双边贸易中出现的摩擦和问题, 如前些时候发生的“饺子中毒”事件, 并

¹ 《温家宝和安倍出席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会议》, 新华网, 2007-01-13。

² 参见《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新闻公报》转引自商务部官方网站, <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zrjgedh/knmueb/200712/20071205261263.htm>

要通过外交协调尽快启动中日自贸区谈判;要通过外交协调妥善处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的问题,避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剧烈波动;日本对华 ODA 虽已结束,还要在对第三国援助方面进行必要的外交协调。¹ 更加重要的是,在新阶段,已有更多的领域和部门被纳入到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范围中来,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是:在中国积极推行企业“走出去”战略、而日本又在推行“引进外资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应该通过有效的外交协调,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按日方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净流入),2007年中国对日直接投资 1700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50.4%。²

节能环保方面的外交协调越来越成为中国对日经济外交的重要领域。在 2007 年 12 月 1 日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上,中国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回顾中日两国近 30 年的环保合作,可谓规模显著、领域广泛、成果丰硕。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两国高层领导的积极推动下,在两国《环境合作协定》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环境合作联合公报》等文件的指导下,双方共建了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启动了中日环境合作联委会,实施了中日环境示范城市和中国城市环境信

息网络建设等重大合作项目。展望未来,我们的合作前景更加广阔,中国拥有环境保护的巨大需求和广阔市场,日本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两国的环境合作必定是互利共赢的。”为此,他代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一、双方应以今年四月签署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的联合声明》为契机,深化合作内容,建立合作资金机制,制定出更加务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二、加强技术、人才、经验的交流和引进,围绕环保的重点工作,积极引导产业界、特别是企业广泛参与两国的环保合作,实现政府和民间环保交流与合作的良性互动,为两国环保合作增加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三、进一步深化两国已有的合作平台和合作机制,拓展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方式,充分发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中日环境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在农业、金融业、中小企业等领域,中国对日经济外交也将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责任编辑:李丹)

¹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新闻公报》明确指出:“双方确认开展对第三国援助对话的意义,将继续保持对话。”

²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方网站, http://www.jetro.go.jp/jpn/stats/fdi/data/bpfd04_0803.xls

Abstracts

Articles

China Boun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Unprecedented World Economic Growth

— Speech a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an KiMoon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Japan Entering a Brand-New Stage: The Motivations and the Situation

JANG Ruiping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Japan retain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otal deploy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es. Now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Japa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push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tinuously warming political relations, fluctuating economic relations,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crucially progressive stage and looming global economic risks. In this new stage,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Japan takes on a new situation in many respects. What should concern us most are its stronger drives, more definite goals, more explicit structure, more improved mechanisms and unprecedentedly expanded field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hina-EU Relations

ZHAO Huaipu

Unparalleled breadth and width of cooperation in history mixed with unprecedented contradiction and friction is the major character of the current China-EU relations. Due to the slight adjustments of the EU's China policy in recent years, the aspect of contradiction and fri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came prominent and protruding, ushering in a phase of major re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background to the adjustments of EU's China policy is complex, but the deep reason lies behind EU's growing anxiety and worry about the "Chinese model" and its influence. The policy adjustments on the part of EU undoubtedly have negative effects, but the main stream of the overall China-EU relationship remains positive, and the mutual strategic reliance on each other for support is being reinforced by common global challeng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Principles and Ideas for Treatment of Territory Dispute

GAO Fei

Chi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ngest land boundary, the largest number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most complex situation on borders. It's over fifty years since China and Burma started boundary negotiations, though China's strength has greatly increased, its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reatment of territory dispute have not changed in the main. By now except with India and Bhutan, China has settled the trend of the greatest majority of its land bounda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sum up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in its treatment of boundary question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its principles and ideas concerning this ques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China's diplomacy is practical, peaceful and responsible diplomacy.